

徐森玉書札六通所見抗戰故宮文物西遷往事

雷強

國家圖書館檔案文獻中藏有徐森玉先生(1881—1971)致袁同禮先生的六通書札,歸于袁同禮先生(1895—1965)卷宗之下,至今未被學界所知。書札內容多涉及抗戰初期故宮博物院文物西遷的輾轉經歷,據此可知森翁此時的行踪和功業,亦可補歐陽道達《故宮文物避寇記》、鄭重《徐森玉》等書的空缺,著實珍貴。

此批書信共計六札,均由徐森玉先生親筆書寫,整理者按撰寫時間排序,其中前四封為1938年撰寫,後兩封寫於1939年。按語部分,故宮博物院簡稱“故宮”,國立北平圖書館簡稱“平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簡稱“中基會”。

整理如次:

一九三八年

(一)

守和先生左右:在港連接叔平先生催促往筑之函,于廿一晨啟

行,不及待台從蒞臨,至為歉仄。公率領同人入滇之舉,想無障礙,但私衷耿耿,馳系萬分。寶廿三日抵蒼梧,廿四晨乘小輪至戎墟換長途車至都林宿,廿五日至慶遠宿,今日下午抵六寨。慶遠以上,山坡益峻,水流益急,路甚難行。懷遠之龍江兩岸及底均黑石,森如劍戟,亦不易渡也。六寨為粵西入黔之邊境,車輛甚少,頃至車站詢問,日內恐無車赴筑,奈何奈何。塵裝甫卸,特寄此以報踪跡。即請

鈞安

弟徐鴻寶 再拜

二月廿六日

旅店無棹椅,據箱書此,草率不恭

按:“叔平”即馬衡,時任故宮院長,主持文物西遷的工作,“筑”為貴陽簡稱。1937年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正式成立,平館南下人員與該校合組圖書館亦同時組建,隸屬於臨

時大學常委會,館長由袁同禮兼任。然而,作為平館經費來源方的中基會,在其執委會代表司徒雷登的堅持下,認為館員離平南下是私人的盲目行動,應停止與臨時大學合作,結束在南方的各項事務,所有人員須盡快返回北平工作,這與袁同禮繼續與臨大合作、一同遷滇的主張完全衝突。1938年2月,蔣夢麟、張伯苓、梅貽琦三位臨時大學常委聯名致電中基會:“前允平館同人在湘服務,全校師生同深感荷。茲敝校遷滇,務請繼續協助。事關學術合作,即乞惠允電覆。”此外,2月4日袁同禮去信身在香港的平館館長蔡元培,陳述不願北返的理由,亦獲得完全同意,至此袁同禮及南下館員的“入滇之舉”終於“無礙”。據《陳君葆日記》1938年1月4日記述可知,此時徐森玉已抵港,其後雖短暫離開但該月底又回到香港,頗為了解此地平館委員對

此“南下”之爭的態度。蒼梧、戎墟(今名“龍圩”)、郁林(今名“玉林”)、慶遠、六寨皆屬廣西壯族自治區。

(二)

守和先生賜鑒:在六寨候車時曾寄一函,諒先此入照。六寨以上,山路崎嶇,千回百折,直至三日晨始抵貴陽。此間房屋簡陋,人口大增,古物來此月餘,尚存行營,未覓得保藏之處,行營有他用,即須遷出。現租民房暫存,修理運徙,仍需時晷也。楚黔相距稍遠,情形隔閡。如存放地點,省府始終主張在觀音洞,而叔平先生主張在城內,然絕無相當房屋,奈何奈何。計日公已蒞港,聞臨大在昆明有問題,有遷往蒙自之說,果爾則同人赴滇亦有問題矣,至為馳念,寄上貴州名勝古迹概說一冊另封寄,乞暫存。文獻征輯館業已停辦,舊書舖祇兩家無一可購之書也,容再至外縣細訪。勿此,即請

鈞安

弟徐鴻寶 再拜

三月九日

同人均此致意

按:由歐陽道達《故宮文物避寇記》可知,1937年8月14日故宮文物八十箱由水路離開南京,16日抵漢口,轉運火車經粵漢鐵路至長沙,21日存入湖南大學圖書館。1938年1月12日至2月10日,該處文物分兩批轉至貴陽,後暫存城北。觀音洞為政府所屬意存放處之一,但該洞狹小且常年滴水,極不适宜保存文物。由《吳宓日記》可知,袁同禮率領平館南下人員從上海經海路出發,3月8日抵達香港,暫借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辦公,來往書信皆可寄送該所。“遷往蒙自之說”,蓋因臨時大學初到昆明時校舍不敷,只得暫將部分師生遷至

(下轉11版) ➔

◀ (上接9版)

阿拉伯-伊斯蘭研究。他專著涉及的主題廣泛:如古典遺產(希臘-阿拉伯)、哲學、文學、歷史和史學等等。他還寫了關於幽默、賭博,甚至有關伊斯蘭教中“希望”這一情感的文集。他的大麻史,名為《草藥》(The Herb),一直是我的最愛。

對於一般的知識分子來說,羅森塔爾因其考證公元14世紀北非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社會學家而聞名於西方。弗朗茨·羅森塔爾所關注的宏大主題,就是他所謂的“中世紀伊斯蘭教中的人與社會”,即調查由伊斯蘭教法支配的社會所制定的行為規範和法律规定如何與個人及其欲望發生衝突,以及這種衝突如何表現出來,如何影響並塑造了文化。

羅森塔爾還以“可以一試”的態度激勵我。有一次,我問及他如何研究彼此如此不同的多個主題,同時正如我們在研究生院經常被提醒的那樣,確保所有已知資源都“已被用盡”。他回答說,只要材料是原創的,而且工作扎實,就不必過於擔心“完美”,人應該對他感興趣的主題進行研究。

至於保羅·卡爾,他是德國東方研究所所長和開羅基督新教路德宗教會的牧師,後來則

成了波恩大學教授。保羅·卡爾的努力和成就就是多方面的,希伯來聖經的研究(即使在今天,他的版本也廣為流傳,被稱為基特爾-卡爾版聖經, Kittel-Kahle Bible),開羅檔案的研究(Cairo Geniza, Geniza是希伯來語音譯,意為檔案,開羅檔案是大量以猶太-阿拉伯語撰寫的猶太文本的集合)以及阿拉伯皮影戲的研究,卡爾均有所創獲。

除此之外,他還撰寫了有關中國明代瓷器中的伊斯蘭圖案的文章。他的個人藏書(現在都靈)含有涉及某些研究主題(如皮影戲)的最為豐富的資料,但也收錄有宗教小冊子、咒符和與埃及基督教會史相關的資料,這些均顯示出其研究興趣的廣泛。

當我审阅他的手稿(其中常常附上他手書批注),閱讀他的研究論文,並憶及其不同尋常的學術生涯時,總是為他對閃語文學的淵博知識,對埃及民間文化的熱愛以及對正義的追求而深感敬畏。在1938年德國排猶的水晶之夜後,卡爾的妻子幫助猶太人鄰居清理廢墟,却被人舉報,卡爾因此丟掉了他的波恩大學教授職位,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流亡英格蘭。

作為學者、老師和人文主義者,他們設置了高標準。而他

們在廣闊的學術領域中的開創性研究工作中展現的視野和成就則是後來者靈感的源泉。

文匯報:阿拉伯語及阿語文獻對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毋庸多言,但目前我國的阿拉伯(語)研究仍處於草創階段,和西方強國差距較大,也遠不及同屬東亞文化的日本。那麼您對於建設中國的阿拉伯學-中東文化研究有何建議?怎樣才能走出一條不失自身文化本位,又能和國際前沿對話的道路?

郭黎:哦,這是我們需要在中国進行的一次討論。我能給出的提議是北京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和上海外國語大學等擁有一線阿拉伯語課程的學校應該開始認真討論此事。當然,問題在於,誰來成為發起者?誰有興趣開設全面的阿拉伯語研究課程,即不單單是語言和文學,還有歷史、文化、宗教和其他相關領域,就像我們在西方和美國所能看到的。你已經提到日本的例子,我們可能會效仿這一套。在我看來,日本在這方面追趕歐美的方式是派遣學生到西方攻讀近東研究(包括阿拉伯-伊斯蘭研究),在各個領域內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再聘請他們回國在教學和研究機構工作。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了

這項工作,並在政府與私人基金來源的支持下繼續努力。此長期規划現在已經開始取得成果,人們目前開始注意到日本學者的工作和活動。也許這是我們可考慮的模式?近年來,我遇到了一些中國學生,他們在賓夕法尼亞、芝加哥和密歇根等大學的頂級項目中攻讀相關博士學位。如果他們歸國工作,就會在中國播撒下這一學科研究的種子。

文匯報:由於我本身在綜合性高校工作,同時又曾有在外語類高校求學的经历,所以能夠感受兩類高校在培養模式、教育目標之間存在的差異。而對於專門領域的研究者,無疑需要和各外語學院的師生開展合作研究。但在一些非應用性的領域(注:“應用性”指的是語言翻譯、政策性研究等,即所謂的“一、二線”),特別是需要長期积累的歷史、文化領域,仍有必要開設相應的專業語言課程,甚至將(多種)語言技能作為相關領域碩博士培養的必修課程。這必然要求和外語學院不同的教學體系和標準,而西方的高校在這方面非常成熟,不知道您是否能就此給予一些建議?

郭黎:當然,在這方面你比我更有更多的經驗,因為我已經離開教學一線很久了。在我對

於你剛剛提到的“三條戰線”的理解中,你和我關心的都主要是第三方面,即長期建立高質量的學術研究和教學計劃。就中國而言,在我看來,第三線必須設立於擁有人文和社會科學悠久傳統的一流大學內。在美國人看來,這並不是一個問題,因為阿拉伯語一直只在主要的精英大學內開設(美國沒有任何外語大學)。鑑於中國高等教育的格局,當然有辦法促進合作。在上海和南京等附近地區,小型研讀會可能是開啟合作的恰當方法。譬如,復旦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和南京大學可以組成研讀會(如阿拉伯語、波斯語與土耳其語)和工作坊(如歷史、藝術史與宗教),由在蒙古、元史、阿拉伯文化研究、中亞歷史與中東歷史等方面懷有相近興趣的研究生和年輕教員參加。這可能是合作開始的第一步。說實話,我有点驚訝,即使在中国的一流大學里,也沒有定期開設有關中東(中近東)歷史與文化的課程。我所了解到的這些情況,或許與更大的一个问题——中國大學“世界史”課程的未來有關。顯然這是另一個應該開始討論的主題。

(翻譯/上海外國語大學胡甄卿)